

# 无声的战略： 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本事”与百年认知史

马建标

**摘要** 19、20 世纪之交，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先后发表两次门户开放照会，特别是 1900 年 7 月 3 日发表的第二次照会，其过程曲折而传奇。此次照会的发表是美国旧殖民主义思想与新殖民主义观念相互妥协的结果，同时也象征着美国走向了以“新殖民扩张”为手段的非正式帝国之路，是为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本事”。但是，对于 20 世纪中国学界而言，真正决定时人对门户开放政策认识的因素，并非该政策制定的实际历史过程，而是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战略格局。从 1900 年到 1945 年，美日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促成了中国的“联美制日”战略，同时促使时人倾向于认同乃至赞许门户开放政策；新中国成立后的前 30 年间，在美苏冷战格局的制约下，中国对门户开放政策的认识被纳入“美国侵华史”的叙述体系；1978 年中美建交之后，中国学界对门户开放政策的认识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叙事框架。由此观之，20 世纪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战略格局，作为一个无声的政治力量一直在影响着时人对门户开放政策的认知，构筑了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语境。

**关键词** 历史语境 门户开放政策 中美关系 改革开放

DOI:10.16240/j.cnki.1002-3976.2025.02.015

## 引言

在美国的对外关系史上，有三大外交政策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分别是：门罗主义、门户开放和冷战遏制政策。其中，诞生于 19、20 世纪之交的门户开放政策，最能体现美国外交观念的内在矛盾和自我调适能力。门户开放政策的发表，正值美国摆脱美洲孤立主义的束缚并向亚太地区扩张的转型阶段，在美国外交政策史上承上启下，既带有门罗主义的历史遗风，又开启了美国参与全球事务的先河。需要注意的是，义和团运动催生了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M. Hay)在 1900 年 7 月 3 日发表第二次门

户开放照会，呼吁列强“保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不改变中国自有的一套行政体系和机构，形式上“维持中国的政治独立”，实际上保持帝国主义在华的“半殖民地统治”<sup>①</sup>。

作为近代中外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义和团运动和门户开放政策无一例外地都引起了历史学者的重视。1997 年，美国历史学者柯文(Paul A. Cohen)出版专著《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sup>①</sup> 丁名楠、张振鹏：《中美关系史研究：向前推进，还是向后倒退？——评〈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79 年第 2 期。

*Experience, and Myth*),探讨了人们理解或认知历史的三种途径:事件、经历和神话,藉此呈现“历史的复杂图景”。之后,柯文对义和团运动有了进一步的思考,他提醒人们注意“历史书写的无声之处”。也就是说,历史学者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因面临“无法言说的担心”,而不得不在历史写作过程中“迂回曲折”,乃至“有所掩饰”。这种“无声之处”恰恰隐藏着历史的奥秘。诚哉斯言!

但是,这种“无声之处”,不仅隐藏于历史书写的过程中,也与历史事件发生时所处的“国际战略格局”息息相关。比如,1900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发表的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在文本设计过程中,有谁参与进来,又是怀抱何种目的?为何门户开放政策的文本最终是这样的,而不是别样的?本文依据新发现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典藏的美国国际法教授摩尔(John B. Moore)档案以及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外交部的相关书信档案,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最终发表过程,以及20世纪中国学界对门户开放政策的百年认知史,做一个简略的分析和探讨。

## 一、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发表的“帝国本事”

19、20世纪之交,美国政府先后向英、法等帝国主义列强政府发表两次门户开放照会。1899年9月6日,国务卿海约翰向列强政府发表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其内容是承认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并在此前提下,要求美国贸易的机会均等;1900年7月3日,发表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增加了一条新内容,就是呼吁列强“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在论及门户开放政策的发表过程时,中国史学界基本上都做如此表述。由此很容易产生一种“美国例外论”的印象,即美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不同,没有对近代中国的领土实施过侵略行为。

早在1979年,汪熙就曾指出,门户开放政策研究需要在“第一手资料”上下功夫,才能有“质的突破”。他说,“我们写‘门户开放’政策却看不到海约翰的亲笔文书(藏美国国会图书馆)”,“缺少第一手的资料就不能不影响到科学研究的质量”<sup>①</sup>。1900年7月3日,美国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的发表,确实意味着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独树一帜,不再走列强武

力抢占中国领土的炮舰外交老路。但是,此次门户开放照会的背后有何隐情?美国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政府基于何种考量,最终选择了“非殖民原则”的门户开放政策?

在过去的研究中,有一个关键人物被忽略了。此人就是时任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教授的摩尔(John Bassett Moore)。摩尔当时兼任美国麦金利政府的法律顾问,他全程参与了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的设计过程。摩尔因为隐藏在麦金利政府外交决策的幕后,而未能进入历史学者的研究视野。相反,历史学者在研究门户开放政策的发表历史时,关注最多的对象是国务卿海约翰及其好友、中国问题专家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尽管柔克义与美国政府高层人士如国务卿海约翰、参议员洛奇(Henry C. Lodge)等权势人物交往密切,同属于一个“小圈子”,这在当时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但是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那就是柔克义遭到时任总统麦金利的“不信任”或者说“不欢迎”。海约翰国务卿曾亲口告诉摩尔:“前总统克利夫兰(Stephen G. Cleveland)对柔克义有一种强烈且‘无法理解’的偏见,甚至麦金利总统上任时警告他不要信任柔克义。”受此影响,当海约翰、洛奇等人起初推荐柔克义担任美国驻华公使时,一度遭到麦金利总统的拒绝<sup>②</sup>。应该承认,柔克义在1899年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的内容起草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1900年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上则作用不大。真正发挥关键作用的是摩尔。义和团运动为列强瓜分中国提供了可乘之机。在此关键的历史时刻,美国是应当跟随列强一起瓜分中国领土,还是采取隔岸观火的中立立场,抑或改弦更张、实行新的对华政策?麦金利政府对此一度犹豫不决。

事实上,美国在华外交官和海军部门更倾向于抢占中国的领土。19、20世纪之交,中国正处于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严峻关头,美国驻华公使康格(Edwin H. Conger)建议国务院“租借”渤海湾内一个海港来“扩大美国的影响”;美国海军部要求把福建三沙湾开辟为“煤站”;参与镇压义和团运动的美

<sup>①</sup> 汪熙:《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1979年第3期。

<sup>②</sup> John Bassett Moore Diary, July 23, 1900, Box 1, John Bassett Moore Papers, Manuscript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 C.

军司令官沙飞(Adna R. Chaffee)提出把直隶全省划为“美国势力范围”,还一度考虑夺占离长江口不远的浙江舟山<sup>①</sup>。上述主张通过不同渠道最终反馈到美国总统麦金利那里,让麦金利心动不已。

正在麦金利总统和他的内阁成员在对华政策上举棋不定之际,国际法专家摩尔关于对华政策的建议,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1900年7月1日,国务卿海约翰在和摩尔共进午餐时告诉后者:“麦金利总统倾向于在中国夺取一个港口,以便在那里立足。”<sup>②</sup>当海约翰就中国问题咨询摩尔的建议时,摩尔趁机指出,美国应该对华采取“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门户开放政策,而不是占领中国的领土。其理由之一是美国国内的舆论不赞同对华采取炮舰外交政策,但可以将美国对待美洲的“门罗主义政策”适用于中国,因为美国拥有了菲律宾,使得中国和美国的地理政治关系近在咫尺<sup>③</sup>。基于此种理由,摩尔建议海约翰对中国采取门罗主义的“非殖民原则”,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领土。最终,海约翰采纳了摩尔的建议,并在两日后发表了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这一历史事实,说明由于国内外的各种原因,美国麦金利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的计划并未实现。

7月23日,海约翰再次告诉摩尔,尽管整个内阁都主张维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但是麦金利总统似乎持相反意见,表示“想分一杯羹”<sup>④</sup>。由此可见,麦金利政府对中国是怀有领土野心的,只是美国没有像日本、沙俄那样与中国地理接近的便利条件,也没有像英国那样可以远涉重洋、大举侵入中国领土的军事力量,因此限制了麦金利政府实施武力侵华的可能性。同时,国际法专家摩尔反其道而行之,为麦金利政府提供了另一个既顺应时代潮流,又可以实现对华扩张意图的替代方案——那就是以国际法为武器,对中国采取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渗透手段。

摩尔的“门户开放政策”方案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超过英、法、德等欧洲列强,开始向海外扩张。进入20世纪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已经把世界瓜分殆尽,摩尔的方案正好适应了这种变化了的世界形势,也就是放弃占据领土的旧殖民主义政策,转而采取新殖民主义手段,即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的方式。用梁启超的话说,摩尔的方案本质上是一种“新帝国主义”。1901年,梁启超在《灭国新法论》中

指出,美国现政府对东亚采取“帝国侵略政策”,在同年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指出,“美国向守门罗主义,超然立于别世界者,亦遂狡焉变其方针”,转向了“新帝国主义”<sup>⑤</sup>。

1908年,美国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政府通过的“庚款退还”计划,不仅遮蔽了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新帝国主义本事”,还将晚清以来形成的中美“特殊关系神话”推向了高潮。如美国学者韩德(Michael H. Hunt)所言,美国退还了一部分庚子赔款,符合美国人传统上所相信的“中美特殊关系”。韩德指出:“当美国的索赔额低于中国承诺支付的金额时,西奥多·罗斯福自发地、无条件地退还了余款。这种慷慨的行为几乎立刻成了编造神话和夸夸其谈的对象。”<sup>⑥</sup>

莎拉·康格(Sarah Pike Conger)是美国驻华公使康格的妻子,也是义和团围攻北京公使馆的幸存者之一。她在1910年写道:“美国主动放弃义和团赔款的态度,是博爱无边,无法言表的。当这种态度能够扫除经济利益的重担时,它难道不显示出一股强烈的姐妹般的善意吗?这种态度不是自然产生的;它的种子是‘五月花号’带来的,植根于自由的处女地里,用珍贵的露珠浇灌;被爱的温柔滋养;在真理的坚毅中得以维持。这就是我们国家态度的故事。”<sup>⑦</sup>

① 丁名楠、张振鹏:《中美关系史研究:向前推进,还是向后倒退?——评〈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2期。

② John Bassett Moore Diary, July 1, 1900, Box 1, John Bassett Moore Papers, Manuscript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 C.

③ John Bassett Moore Diary, July 1, 1900, Box 1, John Bassett Moore Papers, Manuscript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 C.

④ John Bassett Moore Diary, July 23, 1900, Box 1, John Bassett Moore Papers, Manuscript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 C.

⑤ 《饮冰室文集点校》第2集,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23~732、761~768页。对于梁启超关于“门罗主义”的研究,参见章永乐《作为“门罗主义”研究先驱的梁启超》,《北京大学学报》2023年第5期。

⑥ Michael H. Hunt, “The American Remission of the Boxer Indemnity: A Reappraisal”,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72(3).

⑦ Sarah Pike Conger, *Letters from China*, Chicago, 1910, pp. 372-373.

享有盛名的《远东国际关系史》(*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著者之一必亨利(Harley Farnsworth McNair)在1924年写道:“美国国民认为他们的政府在把多余的资金返还给中国方面是公正的……令人高兴的是,美国人的正义感、友谊和对公平竞争的渴望每时每刻都在上升。”<sup>①</sup>两年后,清华大学的美国籍教师卡罗尔·马伦(Carroll B. Malone)在论及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事件时坚持同样的论调。他写道:“没有记录显示,美国对这些资金的使用施加了任何具体的条件。已公开的文件显示,中国表达了深深的感激之情,完全把返还的时间和方式留给了美国政府,并且很坦率地表示,她打算把这笔钱用于资助中国的留美学生教育。这样做是为了表达她对美国政府友好的感激之情。”<sup>②</sup>1967年,著名学者入江昭(Akira Iriye)在他的著作中,仍然称赞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慷慨行为<sup>③</sup>。史学界对美国主动退还庚子赔款的历史书写越是赞美,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新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就愈加地被遮蔽。

只有将美国门户开放政策放在19、20世纪之交东亚国际关系的竞争格局中,才能更全面、更客观地理解美国对华政策的扩张本质。作为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的起草人之一,柔克义在1914年回忆日俄战争的影响时指出:“遏制沙俄在中国东北扩张的角色本应由美国来承担,却不幸地落在日本人的身上,使日本成为‘权力平衡’的主角。”<sup>④</sup>正如美国学者佩福(Nationiel Peffer)所言:“美国竭力设法阻止某一国家来独占中国,当帝俄是远东最大的威胁的时候,她便致力于阻遏那个国家。自从1905年日本消除了帝俄威胁,她就专门对付日本……她屡次出面干涉,并不是因为她尊重凯洛格非战公约的不可侵犯,而是由于她不让任何国家把中国占为己有。”<sup>⑤</sup>

几乎从门户开放政策提出之日开始,美国的战略理论家们就把美国与列强在中国争权夺利的国际竞争关系,置于门罗主义和国际法的话语叙事之中,把美国描述成东亚地区国际正义的维护者。1920年,美国前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在一次演说中指出:“几十年来,美国的国际主义者一直在与世界争论将法律和司法手段运用于国际事务”,也就是将“门罗主义原则推广到全世界,是过去三十年来美国政治家的理想”<sup>⑥</sup>。从根本上而言,门罗主

义乃是美国中心主义的代名词,是美国“国内法”向海外输出的产物,门户开放政策也是美国国内法律观念向东亚地区输出的结果,二者本质上都是一种法律帝国主义行为。

## 二、中国学界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认知史

最早认识到美国门户开放政策是一种“新殖民政策”的代表性人物,首推梁启超。1901年,梁启超在《灭国新法论》中指出,列强灭国之法已经从“虎狼”的手段转向“狐狸”的手段,通商、放债、代练兵、设顾问、通道路、煽党争、平内乱、助革命,凡此种种,均可以称为“灭国新法”。梁启超将美国的“Open Door”解释为将全国开放为“通商口岸”,指出“门户开放”好坏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不平等的治外法权。由于中国处于列强的治外法权之下,其结果是“西人商力所及之地,即为其国力所及之地”,“举全国而为通商口岸,即举国而为殖民地”<sup>⑦</sup>。彼时,梁启超还是清政府的通缉犯,在海外长期漂泊流浪,故而他对于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尖锐认识对晚清政府和国内舆论界的影响实在有限。相反,门户开放政策还激发了晚清政府联络美国的主观愿望,并在1908年派遣唐绍仪赴美,试探“中德美三国结盟的可能性”<sup>⑧</sup>。

进入民国之后,随着日本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

① 转引自 Michael H. Hunt, “The American Remission of the Boxer Indemnity: A Reappraisal”,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72(3).

② Carroll B. Malone, “The First Remission of the Boxer Indemnit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26(CXXXII).

③ Akira Iriye, *Across the Pacific: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1967, p. 124.

④ 转引自汪熙《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1979年第3期。

⑤ Nationiel Peffer, “American’s Choice in the Far East”,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186, 1936.

⑥ League of Nation Will Extend US Freedom, October 20, 1920, Box 23, Paul S. Reinsch Papers, Wisconsin Historical Society, Madison, Wisconsin.

⑦ 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74页。

⑧ 陶文钊:《日美在中国东北的争夺(1905—1910)》,《世界历史》1996年第1期。

加强,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遭到日本的有力挑战。面对东亚地区的这种国际局势,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基本上都奉行“联美制日”的外交战略。受此影响,民国时期的中国学者对门户开放政策的认识基本上以正面评价居多,往往将美国与侵略中国的其他列强区别对待。以刘彦的《中国近时外交史》为例,其书称赞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实救中国于瓜分场中”,令“列强敛步息争”,是在“谋世界公共之平和”<sup>①</sup>。

1938年,美国学者惠特尼·格里斯沃德(Whitney A. Griswold)的《美国远东政策史》出版。该书首次系统论述了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和发表过程,并对门户开放政策给予积极评价,认为门户开放政策的目标是“商业性质的,而非政治性的”,美国人追求的是在中国的“商业机会均等,而非领土占有”<sup>②</sup>。值得注意的是,格里斯沃德在书中还提到了晚清海关职员英国人贺璧理(Alfred E. Hippisley)和柔克义一起参与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的起草过程。这本著作出版后,引起时任中国驻美大使胡适的注意。

时值1939年,胡适了解到贺璧理的故事之后,联络他的好友、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最后由郭泰祺出面于1940年4月19日致电国民政府,请求对贺璧理给予褒奖。郭电写道:“最近美国史学家发现英人 Hippisley 及美国前驻华公使 Rockhill 二氏对于门户开放主义贡献甚多。查 Hippisley 曾于1867年至1910年间在我国海关邮政任职,当时鉴于列强在华争取势力范围,以为非实行门户开放必难保全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及维持美国在华之利益。W. W. Rockhill 为其至友,复有戚谊,所见与 Hippisley 亦同,经二氏共同努力,迭向国务卿 John Hay 条陈,门户开放主义终成为美国远东政策之根本原则及九国公约之基础。”<sup>③</sup>不幸的是,贺璧理已在1939年9月去世,错过了在生前享受国民政府褒奖的机会。但是,郭泰祺还是联络到了贺氏的遗孀威廉斯(K. E. Williams)。1940年3月10日,郭泰祺在给威廉斯的信中写道:

不知您是否知晓,近期美国史家研究指出,已故令夫贺璧理公,曾与柔克义公通力合作,在制定门户开放政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贺、柔二公之努力,共同构成《九国公约》基石,该条约

如今管理着所有与中国相关之大国关系。故惊闻贺公已于二十八年(1939年)九月辞世,我与在华盛顿之同事胡适博士深有此感,即贺公此重大工作当留显名于世,并将提请中华民国政府授其适当之嘉奖。我深感致信贺公姊妹之必要,告知除身在中国海关总署之忠诚优异服务外,贺公亦将以一伟大政策合著人身份为中国人民所铭记。该政策不仅为中国及其友邦联系增添稳定因素,更为善于思考者推崇,深感成为被普遍接受的世界新秩序根本原则之必要,在此新秩序下,各国将共享和平与繁荣,不受仇恨与歧视之阻碍。<sup>④</sup>

郭泰祺的这封信引出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史上的一段公案,即贺璧理帮助美国政府起草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是否有英国政府的幕后作用。格里斯沃德在其书中认定贺璧理之所以参与门户开放照会的起草,并非他本人的意愿,而是受到英国政府的暗中指使。但是,贺璧理及其家人一直否认他与英国政府的关系。1940年4月2日,贺璧理的侄女伊芙琳(Evelyn W. Hippisley)在给郭泰祺的回信中说:

先舅为人低调,始终疏离“‘门户开放’政策作者”之名,因该策已归功于美国务卿海约翰,且若非柔克义公信函被发现,先舅之努力恐终将难为世人知晓。……彼时大英与列强关系不佳,先舅乃通过柔克义公开展工作……柔公与先舅乃挚友,并有姻亲关联。先舅唯一目标乃中国之福祉,正如其1867至1910年间在华漫长生活所秉持之相同态度……先舅曾于某会议被告知,其在华职责乃维护不列颠之利益,然其反驳曰:“否,我乃前来照顾中国之利益。”我有意出版先舅所著回忆录,抑或目下长存我心田之记忆片段,此等材料都将鲜明反映先舅之志

① 刘彦:《中国近时外交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第289、290页。

② Whitney A. Griswold,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38, p. 8.

③ 《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相关函件等》,1940年4月19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馆藏外交档案,档号:11-33-02-02-011。

④ 《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相关函件等》,1940年3月10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馆藏外交档案,档号:11-33-02-02-011。

气,同上文一致。同时,有先舅致柔克义公诸信件副本一份,阁下或感兴趣。该副本现存华盛顿国家档案馆,而我希望将原件交予(该档案馆之)记录处,以便保存。<sup>①</sup>

换言之,贺璧理完全是出于个人情谊才协助柔克义行事。郭泰祺对此不置可否,他和胡适此时发掘英国人贺璧理与门户开放政策的故事,实际上主要是为他们联络英美、协助抗日的外交活动,寻找一个切入点 and 历史素材。因此,他给伊芙琳的回信旨在突显和夸赞“贺公”伸张中国利益的杰出贡献:

您4月2日致信,附令舅贺璧理公生前与柔克义公就在华“门户开放”通信副本,在下深表感谢,副本已怀深切兴致拜读。我将就此通信副本额外复制,并取其一一呈交我重庆外交部。望女士出版贺公之回忆录,此回忆录将助中国与英语世界民众,不仅就贺公门户开放政策之贡献,更就贺公对其效力之政府与人民所作伟大奉献获得更深理解,并使民众公正评价贺公于彼中国外交关系重要时期之地位。我与我中华民国同胞深感痛惜,因贺公贡献为我国所晓甚迟,且我政府深陷抗日苦战,故未及以中国名义,于贺公生前向其表达适当感激。但贺公将永世为中国人民所珍视、铭记,日后史家作注,亦将持公允态度,予贺公以应有之褒奖。<sup>②</sup>

认识到郭泰祺呈请国民政府褒奖贺璧理背后“争取抗日外援”的现实目的,更有助于我们穿透那些天花乱坠的文字,理解时人为何如此推崇门户开放政策的原因。

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中国,国共内战与美苏冷战交织在一起。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此背景下,大陆史学界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进行了再认识,重点是揭露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侵略性质。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著是刘大年1951年出版的《美国侵华史》。

刘著《美国侵华史》撰写的起因,是为了揭露美国“扶蒋反共”的真面目,得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直接支持。1946年6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反对美国对蒋军事援助法案的声明》,指出:“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继续以出售、交换、租借、赠送或让渡等方式将军火交给中国的国民党独裁政府,坚决反对美国派遣军事使团来

华,并坚决要求美国立即停止与收回对华的一切所谓军事援助,和立即撤回在华的美国军队。”<sup>③</sup>在范文澜的帮助下,刘大年在1947年秋完成《美国侵华简史》初稿。次年8月,《美国侵华简史》初稿送交中央宣传部陈伯达和田家英等人审阅,意见是“缺乏原始资料,叙述有简单化和不确切的地方”。为此,田家英与主管中央档案的同志接洽,让刘大年查阅了“当时属于机密的赫尔利在延安与毛泽东谈话的记录”<sup>④</sup>。1949年8月,华北大学内部自印《美国侵华简史》,同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人民日报社社长胡乔木从一位编辑手中看到《美国侵华简史》自印本,决定在报纸上全文连载。1949年8月26日到10月6日,《人民日报》以“美国侵华史”为名连载。在当时“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普遍存在而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却已恶化的特殊时期”,《美国侵华简史》在思想界引起很大的震动<sup>⑤</sup>。该书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有专门的论述,指出门户开放政策丝毫没有“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的意味,恰恰相反,是“想获得独占特权的口号”,是一种“帝国主义侵略的同盟”<sup>⑥</sup>。

1951年8月,刘大年著《美国侵华史》在人民出版社出版,此版本在《美国侵华简史》基础上,增加了美国“企图武装占领台湾作最后挣扎”“抗美援朝运动兴起”等内容。随后,苏联对刘著《美国侵华史》进行了翻译,先后两次在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印刷,并在1953年获得“斯大林奖”<sup>⑦</sup>。由此,刘著《美国侵华史》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开展反美宣传的重要书目,亦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外关系史研究范式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美国侵华史”和“帝国主义侵华史”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主流研究

① 《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相关函件等》,1940年4月2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馆藏外交档案,档号:11-33-02-02-011。

② 《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相关函件等》,1940年4月9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馆藏外交档案,档号:11-33-02-02-011。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124页。

④ 张海鹏主编:《刘大年全集》第14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08~111页。

⑤ 张海鹏主编:《刘大年全集》第14卷,第114页。

⑥ 张海鹏主编:《刘大年全集》第4卷,第24页。

⑦ 张海鹏主编:《刘大年全集》第14卷,第117页。

课题。

在冷战国际环境的影响下,美国的形象在1949年到1979年的中国历史著述中是极为负面的,被定性为最凶恶的“帝国主义国家”。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一连串重大国际事件,如中苏结盟、美国麦卡锡主义的提出、朝鲜战争的爆发等,从一开始就将中美关系嵌入美苏冷战的框架内。1951年为配合反美斗争的需要,《历史教学》连续发表文章,抨击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和国内的种族主义。当时中国的“美国史专家”队伍规模很小,仅有黄绍湘、杨生茂、刘绪贻、丁则民、刘祚昌等不超过10人(前4人曾于20世纪40年代留学美国并获得研究生学位)。特殊的政治背景赋予这个小规模的美国史研究群体以特殊的使命:“时代要求他们为了反美斗争的需要,写作时代需要的美国史知识,并通过大一统的教材和教育体系,将相关知识传播到全国的历史教学中,帮助塑造学生的价值观、世界观和美国历史观”<sup>①</sup>。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是一项责任重大的使命,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利用专业知识来纠正国人对美国的错误认识和当时盛行的“崇美”情结。

20世纪60年代末,中苏同盟的破裂为中美关系的缓和提供了战略机遇。1969年初,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向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解释称: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动态平衡体系”的关键是要“改善中美关系”,欲使中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挑战者,并成为苏联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最大牵制者<sup>②</sup>。1971年基辛格的两次访华和1972年尼克松的“破冰之旅”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经过反复的沟通,中美两国在1978年12月16日发表《中美建交公报》。两天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这并非单纯时间上的巧合,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大战略中,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因为“美国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要处理的最大的外部因素”<sup>③</sup>。

中美建交与改革开放,奠定了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格局,进而影响了中国史学界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再认识。1979年《世界历史》第3期发表了汪熙的论文《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指出门户开放政策也“包含着美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利益相对抗的一面,它在客观上对抑制或延缓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也起过一定的作用”<sup>④</sup>。此文一

出如石破天惊,立即引起中国史学界的高度关注。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丁名楠、张振鹂首先撰文,批评汪熙对门户开放政策的评价“渲染夸大,不符合历史事实”,并且指出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长久以来在国际上钓取“虚誉”的表象工具<sup>⑤</sup>。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门户开放政策是否有助于维护中国自身的利益。其后,世界史领域的罗荣渠、向荣、严四光等学者也参与了有关门户开放政策的讨论。不同的是,他们更加重视将其放在“国际斗争的全局中进行考察”,并强调美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行为的对比差异<sup>⑥</sup>。

无论是钻研中国史还是世界史的学者们,经过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的集中讨论,越来越认可的一个共识是:美国当初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既不可能完全超然于其他列强,对中国表现出特殊的善意,又毕竟不同于其他列强的惯常做法,不再追求复制既有的“最惠国待遇”,而是创造性地以道义上难以被拒绝的“开放”和“平等”要求,换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更进一步而言,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和理念,不仅体现在美国的对华事务之中,它实际上是美国实现全球扩张的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sup>⑦</sup>。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这种带有极强的自利性和隐蔽性的做法,又恰恰给改革开放背景下亟须打开外交局面、争取更多朋友和支持的中国,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对象。

① 王希:《作为政治的历史知识:中国的美国史书写与教学(1949—2009)》,载王希、肖红松主编《跨洋史话:在全球化时代做历史》,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② Nixon to Kissinger, February 1, 1969, Box 1032, NSC File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College Park, MD, 转引自张曙光《基辛格与中美“解冻”序幕的拉开——兼论外交决策个人因素》,《历史研究》2007年第5期。

③ 陶文钊:《沿着合作共赢之路继续前行——纪念中美建交45周年》,《美国研究》2024年第1期。

④ 汪熙:《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1979年第3期。

⑤ 丁名楠、张振鹂:《中美关系史研究:向前推进,还是向后倒退?——评〈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2期。

⑥ 罗荣渠:《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的一些问题》,《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向荣:《论“门户开放”政策》,《世界历史》1980年第5期;严四光:《美国“门户开放”政策辨析》,《美国研究》1987年第3期。

⑦ 金卫星:《“门户开放”:20世纪上半叶美国扩张战略的历史轨迹》,《苏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 结 语

“门户开放”这个名词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被提出之时,蕴含着美国用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形式为主的“新殖民”取代以武力占据领土为主的“旧殖民”的扩张理念,这一点通过本文援引的摩尔、柔克义、海约翰、麦金利等美国政府决策层内部人士的对话与通信文件可以得到清楚的展现。但此后在整个 20 世纪的历史上,中国人所认识到的这项政策却受到了不同时期的国际环境与战略格局的影响,呈现出相当不同的面貌。从 1900 年到 1945 年,东亚地缘范围内的美日竞争是中国迫切面临和必须应对的主要矛盾,在日本更富威胁的挑战之下,弱势的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联美制日”的战略,对美国多有顺从,更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视为保全自身的重要依托。随后,美苏冷战的展开深刻改变了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 30 年里,揭露和批判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侵华势力”的历史罪状,成为大陆史学界的主流叙事,门户开放政策又演变为美国企图在中国获得独霸特权的代名词。到中美建交和改革开放成为时代主旋律的 70 年代末期,“门户开放”又一次牵动学者们的研究眼光与敏感神经,引领研究历史上的中美关系并借以拓广现实中国国际格局的潮流。时代背景对人们认识历史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历史真相”的消解。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意识到这种影响历史认知不可避免的外在因素之后,回归学术研究的本源,实现历史学厘清事实和探寻“本事”的根本目的,从而化被动为主动,更准确地发挥历史人文研究的现实意义。

一方面,研究者应当努力挖掘历史名词在各自的特定语境中的“本来含义”。即使同一个词语,应用在不同的时空下往往会有不同的意涵所指和表达效果,更何况涉及跨语种、跨文化的应用场景时就更是如此。美国史专家李剑鸣早已指出:“历史上的人们对于很多概念有着与今天不同的定义,在评论他们的言论与思想之前,必须弄清他们当时对有关事物的理解。”他所列举的案例也与本文主旨息息相关——例如,“扩张”这个词在美国历史上基本是一

160 天津社会科学 2025 年第 2 期

个“不含价值评判的中性词”,与中文包含的“侵略”“攫夺”等负面色彩有显著差别。又比如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发生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也与中国革命史上受列宁“帝国主义论”影响而发生的“反帝运动”有天壤之别<sup>①</sup>。

另一方面,研究者不妨转换视角,将不同时期人们对同一历史事物及名词的不同认知作为研究对象,此即近年来新兴的综合学科“人文语义学”的研究宗旨,也是本文努力展示的方向。正如“人文语义学”概念的提倡者张宝明所言,在“辞典式的、去语境化的关键词研究”盛行的背景下,研究者更需要关注实际被使用的、意义更复杂的“观念词”。通过对词语背后蕴含的“观念”的拆解与重新发现,“联通过去与现在,沟通自我与他者”,进而实现所谓“抱有同情之理解的人文关怀”<sup>②</sup>。如果说这样的解释还显得有些抽象的话,张宝明近来关于“文化”与“文明”两词的辨析将其深意展现得更加生动,很好地示范了如何通过“重访当年”实现“观照当下”,通过剖析跨越古、今、中、西的不同人不断阐发“文化”与“文明”的过程,追寻指向未来的“两文”和解的可能路径<sup>③</sup>。本文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尝试用人文语义学的新方法探究“门户开放”这个历史名词,但目的并非在于指正过去人们认知的对或错,而是希望借助这种分析视角,启示今天乃至将来的研究者保持更加清醒的头脑,分辨每一种认知背后的现实动机,为国际政治研究及跨文明对话机制探索注入新的活力。

(本文作者:马建标 复旦大学外交学系暨全球史研究院教授)

责任编辑:王 贞

<sup>①</sup> 李剑鸣:《美国史研究中的文化隔膜问题》,《美国研究》1996 年第 1 期。

<sup>②</sup> 张宝明:《语词观念、知识统绪与人文学术的间道意识:人文语义学建构》,《社会科学》2024 年第 4 期。

<sup>③</sup> 张宝明:《“文化”与“文明”:人文语义学视野下人类的自我救赎——以“当年”与“当下”为主体的思想史观察》,载《人文》第 10 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3 年版。